

第五章 結論

自開放台商前往中國大陸投資後，台商一向是台灣社會關注的焦點。無論是政治層面對主權、統獨的考量，還是經濟上是否造成產業外移等議題，台商常常扮演牽動問題判斷的關鍵角色。本研究在研究過程中，便常感受到該問題的敏感性，然而台商研究並非只能關注宏觀問題，也要瞭解微觀、個體互動下的情境，才能對台商行為的來龍去脈有更完整的探討。經由文獻回顧，本研究指出台商當地化的議題中，除了面對台商與當地投資環境、全球生產網絡的關係外，亦需探討日益蓬勃台商群聚的情況，觀察台商在群聚下社會經濟網絡所引發的現象與實況。

最後，本章將總結本研究的發現，由協力網絡與信任結構開始梳理本研究的分析架構，說明其效應如何呈現在產業群聚的環境中，並且回應最初的研究問題，並於文後提出本研究過程與結果之侷限。

第一節 研究發現

本研究探討主旨在於台商投資中國大陸後的當地化情況，不同於經濟學原子式的分析，本研究轉以經濟社會學強調社會經濟網絡的角度觀之。人的經濟行為乃嵌入在社會互動中，更深一層表示，則如 Granovetter 將人際關係連帶與信任合起來討論，以決定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的高低(羅家德 2000)。台灣企業之所以會創造奇蹟，最大的原因就是透過社會經濟網絡達到交易成本最小化。而今前往中國大陸投資的台商，在面臨不同的投資環境時，為追求投資獲利最大化，尋求降低交易成本，便重新調整與適應打造適合的社會經濟網絡。

因此台商西進投資，則如本研究第三章所陳述，不同於其他外商，台商在習

於擁有彈性的協力網絡的條件下，在投資發展於中國大陸之際，同時已悄悄的將協力網絡重新佈局，或轉換、移植到對岸，並似乎於長江南岸浮現出台商完整的經濟性網絡，使台商得以通過協力網絡，達到降低生產成本與追求效率的目標。

同時在全球商品鏈上，台商亦扮演著半邊陲的角色，在全球製造產業過程中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如本研究所涉及的筆記型電腦與自行車產業便是最好的例子，因此當台商轉向投資中國大陸後，亦成為連結西方大廠與中國大陸當地的關鍵連結者。另外，台商協力網絡核心的價值建立於彼此間信任結構，透過信任台商在交易中減低不少風險與交易成本。以高科技產業為例，已經減少以社會交易為前提，亦非如同市場交易，而是在公司相互間擁有信任結構，彼此有一套長遠計畫，因此不易輕易拆夥（Luo & Yeh 2002）。

本研究第四章則探討台商在產業群聚環境下的情況。當前台商集中在以上海為核心的長江三角洲，其原因除了區位優勢和地方政府支持外，最主要原因為台商相互間為追求效率、降低交易成本、克服環境中不利因素，而呈現一種「以台引台」的作用力。同時，隨著群聚效應，台商間除了舊有情誼外，在當地的新環境中，「人不親土親」的觀念讓台商在當地順著組織或網絡，通過地緣性，同業性，甚至同為台灣人的相同背景，維持彼此的關係網絡，建立起屬於我群、具排外性的「台商圈」，在台商圈中彼此相互合作與分享資訊。且台商在協力網絡中可以進行合作與協調，企業與彼此合作對象進行生產技術、產品、資訊交流，彌補台商多數中小企業內資源不足的限制，達到分享資源、分散風險之目的，提高事業多元化與創新的能力。所以隨著台商產業群聚深化，會加強台商所具有的彈性協力網絡與人情信任結構的程度，以降低風險維持最小化交易成本，呈現有限當地化的現象。

而本研究不否認維持人際信任關係，其本身的成本亦是相當昂貴，故台商在維持彈性協力網絡時，或與應該要輔以契約以降低人際網絡的浮動因素，亦應避免過度依賴強連帶，以阻斷有價值的外界資訊(Burt 1992)，也就是如何整合當地

資源，便是台商成為跨國公司後最重要的考驗。同時除了與當地合作外，更重要的是台灣整體產業環境面臨升級的困境，本研究結果顯示，台商西移不代表就此切斷與台灣或其他台商的關連，相對的台商產品的優良品質與全球中介的資訊連結更讓台商無法自絕於外。因此，唯有讓台灣產業能夠再度升級，突破毛利過低，追求短期效益，創新不足等限制，成為台商的後勤支援，才能讓台商願意並且持續維持與台灣的連結。

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展望

一般而言，研究台商常常會面臨政策、商業環境與局勢變化快速和可靠數據資料不足的限制，為避免這樣的情況，筆者選擇前往中國大陸進行田野工作，以取得一手資料。首先要瞭解，各產業間的生產模式均有不同之處，故在研究選題上必須加以判斷。而本研究採以筆記型電腦產業與自行車產業為例，主要原因在於該兩產業極重視、依賴協力網絡，同時亦充分具有產業群聚的特徵，實乃易於觀察台商產業網絡當地化程度之對象。其他各產業在中國大陸當地化的程度均會有所不同，主要原因各異，從投資地點、產業型態到市場考量均會影響在地化的時間與程度，而本研究主要探討母國制度性社會化的影響，因此其他強調對於當地影響之層次，則非本文所探討之重點，留待他文詳細說明。

在田野操作方面。本研究所訪問的台商都集中在長江三角洲，因上海、蘇南地區為台商主要群聚的地方，且其產業亦較具同質性。至於台商在廣東地區擁有產業群聚的現象，如電子業與製鞋業等，下一階段可以進一步研究珠江三角洲產業群聚情況，並且與長江三角洲做比較，相信對台商在大陸的信任結構、協力網路和產業群聚的現象可以更加清楚。

最後，本研究重視台商西進後，彼此間經濟社會網絡的變化，因此研究對象均以台籍人士、在台資公司工作的當地人為主。而相對的，從當地人角度來分析

台商生產網絡當地化，訪問有與台資企業合作的陸資企業與幹部，探討怎麼打入台商協力網絡？如何形成策略聯盟？怎樣維持與台商社會關係等，亦可做為與本研究相互比較之議題。

